

尤袤本《文选》刊刻过程考^{*}

王 玮

《文选》不仅有抄本、刻本之分，白文、注文之别，还有李善、五臣、六家六臣之异，种类繁多。在现存各版本中，南宋尤袤于淳熙八年（1181）在池阳郡斋所刻李善注本《文选》（以下简称“尤袤本”），是现存完整的最早李善注刻本。关于此本，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其为汇聚众家之长的集大成的版本（王书才《论尤刻本〈文选〉的集大成性质及其成因》，《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而有的学者则认为该本不值得信任（王立群《尤刻本〈文选〉增注研究——以〈吴都赋〉为例的一个考察》，《河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要想判断尤袤本价值如何，首先应了解尤袤本的刊刻过程，即选取了哪些底本和参校本，又使用了什么样的刊刻方式。这些问题尤袤并未在跋文中说明，故而从尤袤本文本出发不失为寻求答案的最可靠途径。

一 关于尤袤本《文选》底本问题的梳理

关于尤袤本《文选》的底本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但始终莫衷一是。最早流行的说法是以四库馆臣、顾广圻等为代表的六臣本摘出说，后日本学者斯波六郎拿出详实的比勘数据，更增加了这一观点的可信度。20世纪70年代后期，程毅中、白化文先生撰《略谈李善注〈文选〉的尤刻本》一文，使得尤袤本的底本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他们提出三点证据否定六臣本摘出说，但底本究竟是什么，也未给出答案（程毅中、白化文《略谈李善注〈文选〉的尤刻本》，《文物》1976年第11期）。继程、白之后，屈守元先生提出新观点：尤袤本当出自北宋国子监本《文选》（屈守元《〈文选六臣注〉跋》，《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自此，治选者多从此说。日本学者森野繁夫发现尤袤本不少注文与集注本（指《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中《文选钞》、陆善经注相合，因而判断尤袤本的底本当与集注本有关（[日]森野繁夫《关于〈文选〉李善注——集注本李善注和刊本李善注的关系》，《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

华书局1998年版，下册，第1020页）。这个观点较有启发性，将之前局限在刻本中的讨论延伸至抄本系统。之后，刘跃进先生发现尤袤本《洛神赋》题下李善注引“《〈感甄〉记》曰”一段为其他版本所无，从而提出尤袤本所据之本“应当是唐代以来流传的另一版本系统”（刘跃进《从〈洛神赋〉李善注看尤刻〈文选〉的版本系统》，《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范志新先生在此基础上，发现《四库全书》所收《六臣注文选》中的《洛神赋》里有与“《〈感甄〉记》曰”相近的文字记录，《四库提要》说这个《六臣注文选》是袁本（袁本指袁褰刻六家本。六家本是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但考察实际所收内容却是一个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后的六臣注本，显非袁本，从而提出“尤本可能主要以赣州初刻本为其底本”（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的观点。随着出土文献的发掘和域外文献的传播，尤袤本底本问题的探讨仍在不断向前推进。傅刚先生通过校勘九条本《文选》，发现“其特征往往与李善本相合，而尤与尤袤刻本多合，是证尤袤本确有底本，非如清儒所说，是尤袤刻书时以五臣乱善所致”（傅刚《〈文选〉版本研究》，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48页）。

以上诸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但也都存在站不住脚的地方。那么，尤袤本的底本究竟是什么呢？

二 从修版痕迹看尤袤本的刊刻过程

尤袤本正常行款是半叶十行，小注双行，行二十一字。仔细研究会发现，尤袤本存在许多修版痕迹，这种情况并非偶然，每卷都有。通过对这些修版痕迹的研究，可以发现尤袤本刊刻过程的蛛丝马迹。

修版痕迹大致可分三类，分别是空字挖改，字词、段落增删挖改和局部版面修改。下文将结合具体例子进行分析。在此之前，需先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尤袤本，已经是据某些内容修版后的面貌，按照这个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项目编号13&ZD109）阶段性成果。

“云有株柞树”。

案：尤袤本“云有五株”挤在一处，较正常行款多一个字，北宋本、奎章阁本、明州本、赣州本恰少一“五”字，盖尤袤本底本即无“五”字。此处虽不能说敦煌本就是尤袤校勘时的参校本，但可以说明尤袤本在校改时确有版本依据，而非随意修改。

2. 卷一〇《西征赋》“(发闾乡而警策) 憩黄巷以滋童”句及注文“《汉书》：湖，县名，今虢州。闾乡、湖城，二县皆其地也”。

案：正常行款为一行二十一字，而此句一行二十七字，小注双行共多出十二字。考北宋本作“汉书湖有闾乡”，恰好少十二字。字数如此吻合当非偶然，尤袤本底本此处原作“汉书湖有闾乡”无疑。胡克家《文选考异》卷二称：“此六字实《续汉书·郡国志》文，疑‘汉’上脱‘续’字，善以注正文‘闾乡’，尤延之取颜《戾太子传》之注‘湖’者添改，不知此正文并无‘湖’字，甚非。”（宋志英、南江涛选编《〈文选〉研究文献辑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44册，第137页）所言甚是。

3. 卷五二《博弈论》“百行兼苞”句注文，尤袤本作“引兴摘暴，一字管百行”。

案：尤袤本“暴一字”挤在一处，较正常行款多一个字。考北宋本、奎章阁本与尤袤本同，然赣州本、明州本作“引兴摘暴，学管百行”。盖尤袤本原据其底本刻作“学管”，后依据其他版本将“学”改作“一字”。这条资料很重要，就现有版本考察，尤袤本确与赣州本关系最为密切。第一类第一条例子已提及，此处不再赘述。

（三）局部版面修改

这类情况与字词、段落增删挖改情况相似，但区别在于此类情况有明显的断版重拼痕迹。如卷一二第六叶后五行，每行二十四或二十五字，较正常行款共多十六字。北宋本此处阙，考奎章阁本、明州本、赣州本无正文“珊瑚琥珀，群产接连。车渠玛瑙，全积如山”句，恰十六字。尤袤本底本此处应无此十六字，然考室町本（指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日本室町初年钞本《文选》）正有此十六字。虽不能说室町本即为尤袤校勘时的参校本，但可以说明尤袤修版有其版本依据，即有这十六字的《文选》版本（或为白文无注本）在南宋时流传过。

限于篇幅原因，暂举以上诸例，说明问题。六十卷本的尤袤本，每卷都会出现或空字挖改，或字词、段落增删挖改，或局部版面修改，或几种并有的情况。虽然这些情况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本的版本价值，但却为我们还原尤袤本的刊刻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相较空字挖改，字词、段落增删挖改与局部版面修改的数量更多。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尤袤本在刊

面貌，无论如何也寻不到它的真实底本。修版前的面貌才应是它底本的样子。那个样子越接近于哪个版本，哪个版本是尤袤本底本的可能性才越高。所以，如果我们还可以还原出尤袤本修版前的面貌，再据此去寻找底本，才会更接近真实答案。之前的学者都是直接依据现在所见的这个已经修改后的尤袤本讨论它的底本，这种思路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修版之后反映出来的不再是其底本的模样。明白这个前提之后，再来看实例分析。

（一）空字挖改

1. 卷一四第六叶“觐王母于昆墟，要帝台于宣岳”句注文，尤袤本作“《山海经》曰：□鼓钟之山，帝台之所”。

案：尤袤本“鼓”字前空一格。北宋本此处阙，考奎章阁本、明州本、九条本旁记，□处并作“经”；然赣州本此处与尤袤本同，并无“经”字。作为六臣本的赣州本，一向被视作是将六家本的五臣注、李善注颠倒顺序而来，那它理应与奎章阁本、明州本同，但此处却并不相同。更为关键的是，尤袤本竟与其同。这条例子，我们既可还原出尤袤本修改前的面貌，即作“经鼓钟之山”；也能找到与它文字相同的《文选》版本，即赣州本。虽然尤袤曾在跋文中批评赣州本“各尝刊勒，往往裁节语句，可恨”，但在刊刻过程中，他参考赣州本的可能性极高。

2. 卷五五第二十叶“臣闻托暗藏形”句下注，尤袤本作“□□日月发挥……善曰：《邓析子》曰……”。开头空两格。按体例，“善曰”之前为刘孝标注。考北宋本、奎章阁本、明州本、赣州本此段全为李善注，无刘孝标注，并作“善曰：日月发挥……《邓析子》曰……”。据此推断尤袤本开头两处空格原或为“善曰”二字，后被挖掉，改在“邓析子”前加“善曰”。仔细考察尤袤本发现“善曰邓析子”五字挤在一处，这一行本应二十一字，现在却是二十三字，恰多两字，这里的“善曰”二字应是后来添加无疑。相同情况，此卷还有三处，分别是“臣闻出乎身者”“臣闻目无尝音之察”“臣闻达之所服”句下，且并是注文开头空两格，注文中间有“善曰”，“善曰”及前后诸字挤在一处。考北宋本、奎章阁本、明州本、赣州本此三处全为李善注，且以“善曰”二字开头。尤袤为何如此修改，修改有何版本依据暂不得而知。

（二）字词、段落增删挖改

这类情况较空字挖改略复杂些，在尤袤本中也更为常见。略举例如下。

1. 卷二《西京赋》“掩长杨而联五柞”句。敦煌本（指饶宗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尤袤本注作“云有五株柞树”，北宋本、奎章阁本、明州本、赣州本作

刻时较为仓促，没有完全定稿就已着手刊刻。其次，尤袤确实是在底本的基础之上进行过修改。早有学者提出尤袤修改《文选》的问题，如胡克家《文选考异》中经常可见“尤删移”“此尤校添之也”“尤延之误取以增多”“此尤校改”等，然这些判语并非全是。通过对修版痕迹的研究，可以证明尤袤确实对部分内容做了修改，同时也可证明其中一部分修改并非尤袤所为，而是其底本既已如此。

三 尤袤本正文夹音注的三种情况

正文夹音注是五臣注本的系统特征，然属李善注本系统的尤袤本正文中却多见夹音注的情况。通过对音注问题的研究，亦有助于探索尤袤本的刊刻过程。

通观六十卷尤袤本《文选》，发现每卷的正文夹音注情况不甚相同，大致可分三类：

(一) 全卷无一处正文夹音注情况。如卷七至卷九、卷一五至卷一九、卷二二至卷二四、卷二六至卷三一、卷三四、卷三六、卷三八、卷四四，共计二十一卷；

(二) 有正文夹音注，但数量不多。如卷一、卷二、卷一〇、卷一三、卷一四、卷二〇、卷二一、卷二五、卷三二、卷三三、卷三五、卷三七、卷三九、卷四〇至卷四三、卷四五至卷六〇，共计二十三卷；

(三) 正文夹音注数量较多，几乎与五臣注本系统数量相当。如卷三至卷六、卷一一、卷一二，共计六卷。

第一，看全卷无一处正文夹音注的情况。

前人多给尤袤扣以五臣乱善的帽子，正文夹音注便是他们的有力证据。但全面考察六十卷的正文夹音注情况发现，有二十一卷正文并未出现夹音注的情况。此外，这些卷目中“赋”类内容绝大部分存在一个共同之处，即每行字数都较正常行款多。通过与北宋本、奎章阁本、明州本、赣州本等比勘，发现尤袤本这几卷的增注情况较为普遍，隔几句就会出现一条其他版本无、尤袤本独有的李善注文。这些卷目为何会出现如此大量、集中，又找不到版本出处的注文？这些注文来源于何处？是李善原有还是尤袤所加？亦或是后人所为？又为何这些卷目的正文部分无一处正文夹音注？这些都值得进一步研究。或许这几卷内容来自于同一底本，而与其他卷底本不同。其实这几卷并非无音注，只是不在正文中，而是在注文末。北宋本残缺较多，以其所存部分校对，发现这些卷目中，尤袤本注文末的音注几乎与北宋本同，而与陈八郎本（指台湾“国家图书馆”藏绍兴三十一年陈八郎宅刻五臣注《文选》）异；但也存在尤袤本有而北宋本无的音注，不过数量较少。如卷一七《文赋》“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北宋本李善注作“轮扁，已见上注”，而尤袤本则详细为轮扁出

注，甚至还有非正文用字的音注：“扁，言音篇，又扶辄切。斫，丁角切。……魄，音普莫切。”这种注释方式并不符合李善作注的惯例。首先，同卷再见者，并云已见上文，务从省也。同卷前文已解释过轮扁，此处应省作“已见上注”。其次，注文中的三处音注皆非正文用字，并不需出注。尤袤此处增加的音注不知来源为何。

第二，有正文夹音注，但数量不多。其中数量最少者仅一处，如卷一〇、卷二五、卷三五等。此类情况在六十卷中占比最大，但较为复杂。如卷一，全卷共计正文夹音注七处，并与五臣音同。而卷二〇，全卷共计正文夹音注十六处，却并非全与五臣音同。集注本、北宋本卷二〇未存，无法窥探李善注本系统的容貌，但可借奎章阁本略探究竟（因奎章阁本中李善注部分即以北宋本为底本，然并非我们今日所见之北宋本）。经比勘，这十六处音注，有十处为奎章阁本李善注文中所有，且内容完全相同；而“赧”“肆”“浮”“舄”“湍”五字，奎章阁本李善注中虽无音注，但正文有夹音注，分别是“女简反”“音异”“音孚”“胡皎”“奴感”，后两处与尤袤本注音相同。又与五臣注本系统相比较，这十六处音注为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指日本东洋文库藏朝鲜正德四年刻五臣注《文选》）所无者有六处，剩下的十处中，五处与陈八郎本、朝鲜正德本音同，五处音异。胡克家《文选考异》卷一谓“凡合并六家之本，于正文下载五臣音，于注中载善音，而善音之同于五臣者每被节去。袁、茶陵二本，又各多寡不齐，盖合并不一，故所节去不一耳。至尤本于正文下五臣音，往往未尝区别刊正，而注中善音，则节去弥甚，其失善旧，亦弥甚矣”（《〈文选〉研究文献辑刊》，第44册，第38—39页）。这段话确实指出了尤袤本音注存在的问题，即多与五臣音同。但同时也犯了一个错误，即以偏概全。卷二〇的正文夹音注情况即可说明：尤袤本正文所夹音注并非全部是五臣音，且绝大部分的音注与李善注本系统相同，只是不知为何将位置从注文中移至正文中，或为方便阅读亦不可知。而那些奎章阁本李善注中没有的音注，应该是来源于尤袤在校勘时的各种参校本，包括五臣注本、六家六臣注本，以及许多我们不曾知晓、未能得见的其他《文选》版本和相关文献。因为“赧”“肆”“浮”这三字的音注既不同于李善注本系统，亦不同于五臣注本系统，在现存各《文选》版本中均找不到依据。

第三，正文夹音注数量较多，几乎与五臣注本系统数量相当。

这类情况较少，且全部集中于赋类，盖因赋中多生僻字，为方便阅读故而在正文中增加了许多音注。又或是因为这几卷尤袤本的底本本就如此，尤袤只是依底本而刻亦不可知。卷四是六十卷中正文夹音注最多的一卷，

共记三百八十七条。这些音注有三个特征：总数略少于五臣音但远多于北宋本或奎章阁本李善注中的音注（北宋本此卷残，残缺部分参考奎章阁本），几乎与五臣音相同，与北宋本或奎章阁本李善注中的音注异。有一问题需要指出。卷四第一叶“於（乌）显乐都”句，於，尤袤本正文夹音注作“乌”。注文曰：“毛萇《诗传》曰，於，叹辞。”胡克家认为“叹辞”下应当尚有“於孤切”三字。北宋本此处阙，考奎章阁本李善注中“叹辞”下确有“於孤切”三字。据此推测，北宋本本文中应有此三字。然集注本李善注并无“於孤切”三字。胡克家评论此句“失善旧”，那么究竟集注本是“善旧”还是北宋本是“善旧”呢？《文选》版本十分复杂，李匡乂《资暇集》称“李善注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之”（李匡乂《资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页），因此不能贸然断言尤袤本“失善旧”。

通过对尤袤本音注的大致梳理，我们发现不仅修版痕迹每卷情况不甚相同，音注问题亦是如此。

结 语

通过以上对尤袤本修版痕迹与正文夹音注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理清尤袤本刊刻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据袁说友《文选跋》可知，尤袤本从校勘到刊刻完毕仅用时一年半（淳熙八年刊刻完毕），而尤袤于淳熙七年刊刻过十八卷《山海经》与两卷《隶续》。尤袤本《隶续》现已不存，而《山海经》现存一帙。检《山海经》版心，未发现重刊字样。版心刻工处较为模糊，可辨认的有李彦、曹但、金大有、张拱、王明、刘彦中等。这些刻工全是尤袤本《文选》的刻工。由此推知，尤袤在淳熙七年、八年时雇用同一批刻工刊刻了三部书。又据尤袤《山海经跋》，他校勘十八卷的《山海经》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而六十卷《文选》是如何用一年半即完成校勘和刊刻的呢？其刊刻过程定有其特殊性和技巧性。他们或许采用了校勘与刊刻同时进行的方式，当发现错误或有需要修改的内容时即作局部修版，

以节省时间和成本。

第二，仔细研究前人的成果会发现，他们提供的证据或多或少都有道理，无法完全推翻。这是为何？其实，尤袤本《文选》的底本问题十分复杂，尤袤在刊刻《文选》时并非选择唯一一个固定的版本作为底本。每卷的修版痕迹和正文夹音注情况不甚相同便是有力证据。尤袤手里或有一个李善注《文选》，但系残本，故在以此残本为底本进行刊刻时，还需借助具有李善注本系统特征的其他版本作为残缺部分的底本。就现有资料看，赣州本可能即是尤袤本多个底本中的一个。而且，赣州本扮演了两种角色，既是部分卷目的底本，又是部分卷目的参校本。此外，尤袤还参考了一些现在无法得见的其他《文选》版本和相关文献，从而形成了跟现存任何版本都有诸多相同又有诸多不同的面貌。因而在讨论尤袤本底本时，不应也不能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这样做往往会遇到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又遇到另一个问题的局面。针对尤袤本的特殊性，不妨尝试以卷为单元，仔细分析尤袤本的实际版刻情况，即通过与其他版本、文献校勘，逐卷突破，再做整体观照。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

尤袤本《文选》并非第一个李善注刻本，却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在其之后，历朝历代的李善注刻本均以其为底本，它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有的学者认为其并不能反映李善注本系统的原貌，但何为原貌？其实尤袤本恰好给我们提供了李善注本系统面貌的更多线索。尤袤本还存在许多值得深入挖掘的问题，不能因怀疑其价值，而放弃了对它的研究，否则将是《文选》版刻史上研究的一大损失。

[作者简介] 王玮，女，华侨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孙少华)